

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美学专辑 ● ● ● ● ●

导 言

傅其林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1001

本专辑的成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22）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关注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问题。符号学在 20 世纪成为一门显学，其中一个主要理论源流是东欧。在东欧涌现了一大批符号学家，他们提出了诸多具有原创意义的符号理论与范畴，对欧美哲学与人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欧马克思主义积极辩证地汲取符号学的方法论，对传统命题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思想。

本专辑的六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点。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拉·克劳索瓦（Nora Krausova）的论文《符号系统理论与文学反映的过程》原文为斯洛伐克语，第一次被翻译为汉语。原文题目为“Teória znakových systémov a proces literárneho odrážania”，为 1987 年捷克斯洛伐克学者米查拉齐（Michaláč, J.）编辑出版的著作《符号、系统、过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问题》（*Znak, systém, proces. K problémom marxistickej semiotiky*）中的第一篇文章。文章采用符号学方法论探讨了文学反映的内在机制，颇为精彩地分析了故事与话语的辩证关系：故事的不同门类“浮出”到表面上来，变成作品话语的门类；话语作为“表面上”的系统只能通过它下面系统的支撑而生存下来，下面的系统则是故事；如果这个基础性的、深层的、生成性

的系统不灵，那么话语只是一链缺乏叙事结构的句子、非符号化的文本、纯粹的言语行为；虽然故事是深层的、排在话语前面的层面，但是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美国学者彼得·施泰纳（Peter Steiner）的英文文章“*When Marxism Met Structuralism for the First Time*”深入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复杂关系，主要定位于1934年的特定历史时空，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建构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张碧的文章《卡冈美学理论中的符号学方法》认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卡冈将现代符号学运用于其美学批评之中。出于对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理解，卡冈一方面将某种类似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运用于艺术批评之中，另一方面在其艺术领域的符号学批评中体现出鲜明的系统论方法特征。因此，卡冈的符号学批评对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秦佳阳的论文《论日常生活符号再现体的实践意义》以符号系统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为视角，分析“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从形式与意义维度重新认识日常生活，并以物化现象为例，对日常生活中符号系统的实践性进行阐释，揭示日常生活中形式指向意义的作用以及形式自身的价值，展现了赫勒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人道主义符号学思想。袁喆的文章《试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阈下的布拉格汉学派研究》主要就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角度来探讨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特点和贡献。在研究对象、本国学术环境等多重影响下，布拉格汉学派受布拉格结构主义影响颇深，并在后期开始与法国结构主义以及美国结构主义接轨。不仅如此，布拉格汉学派能够适时跳出结构主义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学作品进行历时分析。匡存玖的文章《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指出，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在国内开启本土化进程，历经积极引介、深度研究、自觉整理等多个阶段，使关注视野不断从文学领域拓展到符号美学、音乐学、哲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建构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辩证意义论”“结构功能符号学”“意识形态幻象”等一系列焦点论题，并在本土化进程中逐渐上升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三足鼎立的接受格局。针对国内学界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关注不够的情况，这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创新。

作者简介：

傅其林，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Author:

Fu Qilin, Ph. 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Email: fuqilin11@163.com